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热点透析

英国为什么选择“脱欧”

简单的本土公投不适合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民主，只能是政治人物推卸领导责任的工具和公众发泄情绪的渠道。在当今世界，需要用复杂而灵活的机制和政策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不能假民主之名，行泄愤政治之实。

□ 周　弘

为何出现预判错误

英国脱欧结果超过了很多人预料，为什么多数人出现预判错误？我认为主要是由于英国公众当中普遍存在的非理性恐惧和忧虑造成的。根据经济理性测算英国脱欧的利弊可以看出，无论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脱离欧洲都不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但是，英国公众往往不能理解和接受这种经济理性，其情绪被莫名的恐惧所笼罩：抱怨欧盟过于严苛的各种规则有悖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虽然英国已经在欧盟享有很多特殊的自由政策；指责欧盟机构的官僚主义和欧债危机后的无所作为，虽然欧盟机构的任何作为都会因为受到像英国这样的成员国的牵制而降低效率；反对欧盟“四大自由原则”中的“人员自由流动”，尽管英国的经济得益于中东欧廉价而优质劳动力的流入；片面认为英国对欧盟财政贡献太大，但看不到欧盟对于英国各方面的财政转移和支持。英国公民认为自己并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受惠者，而移民和难民的流入则让他们感到已有的福利可能被削减。事实上，这种莫名的恐惧和忧虑都是非理性的。

然而这种长期蔓延在英国公众中的非理性的暗流，没有受到英国政府的足够重视，政府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甩掉讨厌的欧盟，回归民族主权国家”，这样的口号才成为民众当中的时尚。很多英国公众包括一些政府阶层成员都以为脱离欧盟，英国就可以重回自由、自主、独立、强大、富裕。但时代变了。与欧盟分手容易，和43年的欧盟成员国历史告别却绝非简单易行。除了要通过与欧盟旷日持久的谈判来决定这场“离婚案”在各个层次和领域的利益和权力分割以外，最大的问题来自于英国社会内部。出生于英国加入欧盟后的英国人没有“往日辉煌”的情怀，却看到了一个“孤独英国”的更加不可知的未来。

造成了欧盟分裂的英国首先自己可能会分裂，导致欧盟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下降的英国将很可能率先走向未知和衰落。这场政治地震导致的动荡，包括政治人物的辞职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已经开始显现，但这只是开始。对于复杂多变的未来，民众没有明确的预期，政治领导人也没有规划。在一个最需要合作应对经济衰落和停滞的关键时刻，英国却打开了政治的潘多拉魔盒。

这场政治地震的深层原因，则是全球化的经济和国家化的社会之间裂痕的扩大，给世界各地带来了政治不稳定。贫富悬殊早已经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现象，而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有的现象。现行的经济全球化规则使世界1%的人口占有的财富相当于其他99%人口财富的总和，中产阶级缩小而且被剥夺。现代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张正在加剧而不是缓解这种矛盾。国家被世界市场和本土社会撕裂，干预社会分配的能力明显减弱，一些国家政府靠发债、印钞或紧缩勉强维持本国经济运转。经济理性只能解释经济增长，但是没有解释财富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思变是必然的，这种现象在英国仅仅是全球的一个缩影。在英国，依靠社会分配的老年人比适应市场的青年人感到更多的恐惧和不安。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担忧。而简单多数的票决式民主最易于表达社会愤懑和不满情绪，没有政治担当的政治领导人将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决策诉诸票决，让不了解情况的民众决定国家的重大前途问题，这本身就是推卸历史责任。



▶ 当地时间6月24日，英国首相卡梅隆宣布“脱欧”投票结果

国际格局将因之而变

“脱欧”后的英国和欧盟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场改变欧洲边界的地震也将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动。其最终结果还将取决于政治领导人的作为和能力。未来可能的前景有以下几种：一是英国与欧盟在脱欧谈判中纠缠，欧盟尚未衰落而英国率先衰落；二是英国社会分裂、政治动荡、经济萎缩，进而波及欧盟和世界，使世界经济重新陷入危机；三是英国回归国家主义，影响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世界进入再国家化时代，欧盟虽然不会马上解体，但日渐衰落；四是富裕的北欧国家纷纷退盟，而一旦法国右翼政党大选获胜，也会效仿英国脱欧公投，整个世界滑入国家保守主义，各国纷纷重铸国家藩篱，世界市场被割裂肢解，各国为国际投资和贸易设立更多门槛，为人员流动设置更多障碍，推高劳动力和商品价格，在科技发展的作用下失业，特别是长期失业固化；五是没有英国的欧盟国际影响力和经济活力都相对降低，但是内部失衡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欧洲大陆发展模式和社会伙伴关系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如果欧盟能够稳住阵脚，挺过难关、厉行改革、去除官僚主义，以“灵活联盟”的方式，平衡发展程度悬殊的各成员国利益，并以“社会支柱”赢得更多民心，才有可能继续在世界范围内维持一定的影响力。这需要欧盟领导人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前显示出远见卓识，坚定信念和高超的协调与沟通能力。

英国脱欧还带给世人很多有关现代国家的地位和角色的深层思考。当代国家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挑战，需要建立更加灵活和公正的治理体制，应该一边联接世界市场，一边服务本土社会。简单的本土公投不适合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民主，只能是政治人物推卸领导责任的工具和公众发泄情绪的渠道。在当今世界，需要用复杂而灵活的机制和政策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不能假民主之名，行泄愤政治之实。总之，欧洲的前途堪忧，留给欧盟和英国领导人的机遇期不长了。

困境与前途：社会党与西欧的未来

□ 王　燕　谢　峰

19世纪中后期，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党纷纷成立。社会党在成立之初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传统思想中核心的信条即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国家对经济进行有计划的管理。不过，改良主义对社会党影响深刻，党内因此始终存在方向性的分歧：是进行激进革命还是渐进改良？左派支持彻底推翻重建，右派则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渐进的改良。社会党在20世纪上半期逐渐掌权后，尤其在大规模执政的二战后，党内右派占了上风，对传统思想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核心主张是实行混合经济，开展有限的国有化运动，但保留大部分私有制；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刺激经济发展，实现充分就业；在社会领域建立福利国家；在政治领域采取各阶级合作主义；追求一种社会平等的目标。显然，与传统主张相比，修正后的社会党明显右转。

二战后三十年是西欧国家的黄金时代，社会党改造后的西欧一改原来的资本主义面貌，展现出某些社会主义特征。

社会党将上述理论付诸实践，在二战后三十年间取得了成功。二战后三十年是西欧国家的黄金时代，经济繁荣、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物质丰富及消费社会逐渐形成、民众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处境大幅改善，社会党改造后的西欧一改原来的资本主义面貌，展现出某些社会主义特征。社会党认为，他们已找到一条改造资本主义的新路：一方面，经济上通过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大规模干预，可以克服私有制的弊端，避免危机，还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各阶级合作主义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社会党认为，这种渐进改良的方式避免了对原有一切进行彻底摧毁和重建的高额代价，解决了资本主义一直未解决的问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推进社会平等。

上述模式得以有效运行有赖于当时的环境。与今天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相比，战后的西欧处于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环境，政府可以充分行使权力，运用财政政策等手段干预经济，推动经济稳定增长，保持充分就业，国家将由此获得的财政收入投入教育、医疗、交通、失业人群和老年人保障等领域。可以说，该模式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基础上的，国家权力的充分行使则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保证。一旦经济衰退，失业随之而来，国家收入减少，福利开支难以为继，该模式的有效性就会出现问题。

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上述模式开始遭遇挑战。首先是1973年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西欧，致使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此外，西欧在外部开始面临其他经济体的竞争，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在内部又面临一系列问题，如充分就业的实施造成工人阶级及工会势力壮大，廉价劳动力时期结束，企业竞争力受影响。更重要的是，科技革命推动资本、商品、技术、信息在全球流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资本为获取利润，全世界游走，寻找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产地。资本势力的膨胀压缩了政府行政空间，民族国家对经济的治理能力、劳资间的讨价还价能力受到削弱，凯恩斯经济政策的效果明显不如以往，社会党的执政模式受到批评，为右翼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空间。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限制政府作用，在经济领域减少干预，使市场自由运行；在社会领域削减福利，反对劫富济贫的再分配；在政治领域打击工会，放弃各阶级合作主义；在思想领域宣扬责任、个人自由、自助、自立等价值。这增加了经济活力，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社会出现不稳。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党提出走第三条道路，该道路虽然被称为是超越左与右的新路，但在关键的经济领域，其治理方案与新自由主义没有多大差别。

新自由主义出现的问题同样为社会党的东山再起提供了机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党提出走第三条道路，该道路虽然被社会党称为是超越左与右的新路，但在关键的经济领域，其治理方案与新自由主义没有多大差别，在削减政府作用、私有制、自由市场、放松劳动力管制、控制工会势力扩张等方面，社会党明显新自由主义化。社会党仍保留它的标签——福利国家和左翼的平等价值，但它同样主张改革福利国家，平等的内涵也从追求结果平等转为提供机会平等。显然，社会党再次右转。

如果说二战后社会党的右转很大程度是自主选择的结果，那90年代中后期的右转则带有被动反应的色彩。右翼政党利用新自由主义取得一定经济成效，社会党在未找到经济发展新思路之下也希望借用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同时在新自由主义出问题的社会领域，以左翼立场解决之。社会党“左右并蓄”的新思维吸引了选民，它在各国相继上台，第三条道路盛行一时。但是，社会党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严峻，尤其自2000年后，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西欧面临着比80和90年代更激烈的国际竞争。第三条道路的实施没有提振西欧经济，反而新自由主义导致两极分化的本性使社会分裂加大加剧。

施政效果不佳使社会党在十余年间相继下台，第三条道路呼声渐弱，其后上台的右翼未能改变西欧经济整体颓势，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之后的欧债危机，既暴露出右翼新自由主义的大缺陷，又暴露出左翼福利国家的大问题，曾经有效的左右发展模式似乎均告失效，西欧陷入困境，寻找新的治理模式成为摆在左右翼政党面前的紧迫课题。

对西欧国家来说，首要任务是提升国家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只有健康发展的经济才能支撑社会党的福利国家战略，实现平等的目标，无此，其他即是空中楼阁。社会党还需要审视作为政党标志的福利国家战略，福利是它获支持的法宝，是追求平等的手段，但在经济不景气之下仍维持庞大的福利使政府财政不堪重负，但是，削减福利、财政紧缩既会减弱选民支持，也会丧失左翼党的传统特性，这对社会党来说是两难。除了关键的经济和福利问题，社会党还需要审视它在一系列社会问题上的立场，如移民、避难者、犯罪、治安、同性恋、家庭伦理、多元文化。

进入新千年的西欧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国际上有来自新兴经济体强有力的竞争，国内又滋生各种矛盾和问题。

进入新千年的西欧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国际上有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强有力的竞争，国内又滋生各种矛盾和问题。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使得依靠纯粹的左翼政治或右翼政治已无法解决，它似乎需要一种灵活性，在解决不同问题时灵活采取或左或右的立场，但这对西欧左右翼政党来说均非易事。作为执政大党，左右两翼有着各自的传统、价值、政策标签和支持群体，西欧又是竞争性政党体制，且近年来政党体制呈现碎片化发展趋势，政党转向不仅空间有限，且会带来党内分裂、自身特性丧失、原有支持基础游离、政治空间被他党挤占的风险。

竞争性政党体制及左右政治的存在限定了政党的选择空间，形成一种新战略、新模式的难度加大，而选举政治下政党要赢得大选，势必需要回应选民各种个体的、短期的诉求，政党需要短期内见政绩，否则执政地位不稳。如政局稳定、经济繁华，选举政治平稳运转，可显现其各种优势；但若政局动荡、社会冲突严重、经济不景气，则需要稳定的执政期、长期的规划、连续的政策，为国家、民族和个人的长远发展计。当前，西欧面临的问题既复杂又严重，走出困境需要时间，需要凝聚共识，实现合作，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考验着西欧政党和民众的智慧。

国际政治

莫迪伊朗之行

展开印度的西联政策

□ 林民旺

5月22—23日，印度总理莫迪对伊朗进行了两天的国事访问，这是时隔十五年后印度总理对伊朗的又一次访问，上一次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伊朗还是在2001年。此行中，莫迪与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举行会谈，并会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双方签署了12项合作协议。除了两国关于智库、学校的交流之外，最引人注意的是关于查巴哈尔港的一系列合作协议：由两国公司签署的关于查巴哈尔港的开发与运营的双边协议。

西联政策的重大突破

印度对查巴哈尔港的兴趣，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是这次的背景却大不一样。一方面是伊朗的经济制裁解除了，消除了印度与伊朗合作的外在风险和压力；另一方面是印度上台的新总理莫迪更加认真地开始着力构建印度的周边外交，而以推进查巴哈尔港建设为标志的互联互通是其周边外交的亮点。

查巴哈尔港坐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开口，地理位置显要，不论是商业用途，还是战略作用皆是如此。一直以来，印度战略研究界普遍认为，这一港口的建设，将有利于印度避开巴基斯坦的阻挠，直接深入阿富汗与中亚国家市场。显然，这一次莫迪积极把握住了良机，达成了相关协议。

另一项重大的突破就是阿富汗、伊朗、印度签订了《建立查巴哈尔运输与过境走廊的三方协定》。事实上，2003年印度、伊朗和阿富汗就达成过三方协议，当时约定伊朗负责建设查巴哈尔港到阿富汗边境的公路，印度则负责建设连接阿富汗Delaram到伊朗Zaranj的公路。印度自2005年开始修建这一公路，并且已经于2009年修好并投入使用。但是，随着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剧，大部分国家都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阿富汗显然也受到美国的压力而不敢在这一协议上有多少兴趣。

此次达成的三方协议，显然是一项重大突破。莫迪认为，三方运输与过境走廊“将改变本地区的历史进程”，将“推动地区内商业贸易无障碍地流通”，“资本与技术的流入也将在查巴哈尔形成新的产业基础设施”。同时，莫迪似乎别有所指地称，阿富汗将获得一个“稳定、高效且更友好的贸易通道”。走廊不仅能够造福三国，还将延伸至中亚国家，造福地区内的各国。如果这一走廊与南北运输走廊相连接，就形成了一端连着南亚，另一端连着欧洲的贸易网络。而根据研究显示，与传统的海运相比，这一路线将使到欧洲的货物运费减少50%。

西联政策：机遇与风险并存

印度前总理辛格在第一届任内就提出了“向西望（Look West）”政策，强调中东对于印度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却鲜有作为。当时的阻力主要是印度中东政策陷入意识形态禁忌之中，被印度国内政治所绑架。而莫迪上任之初就明确称，印度外交不仅要“东望（Look East）”，还要“西联（Link West）”。继2015年对阿联酋、沙特访问之后，莫迪此次对伊朗的访问就是践行这一政策的又一明证。而他的西联政策显然遇到了良好的时机。

首先，2015年7月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签署以来，欧美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过去印度-伊朗的关系发展一直受限于来自美国的压力。冷战结束后，印度-伊朗关系总体保持着一直发展的势头。1993年印度拉奥总理访问伊朗，1995年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访问印度。随后，2001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伊朗。2003年伊朗总统哈塔米回访印度，尤其是他作为当年印度共和国日的主宾，享受了这一殊荣，也达到了当年两国关系的高峰。随着2005年印美达成民用核协议，印伊关系逐渐变冷，甚至印度两次在核问题上投票反对伊朗。然而，印度也并没有完全屈从于美国的对伊政策，一直采取小心翼翼的举动。

其次，莫迪政府对互联互通的重视，也是西联政策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部分是由于莫迪对印度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瓶颈的认识，也可能部分源于中国的“一带一路”，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等互联互通工程的影响，莫迪强化了对互联互通紧迫性的认识。在印度-伊朗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决定要在地区内部和跨区域范围内推进多点互联互通，期待印度参与查巴哈尔港的建设将打开双边合作和地区互联互通的新篇章，将推动两国发展更多的海上互联互通与服务，双方将授权相关部门详细协商合作细节。而莫迪对阿富汗-伊朗-印度三方过境走廊的更大野心是，“随着时间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考虑将它与印度已经在印度洋地区和东南亚建设的强大的海上、陆地通道对接起来”。而伊朗是印度通往阿富汗和中亚的跳板。

然而，莫迪的西联政策也孕育着风险。印度仍旧需要在沙特和伊朗（穆斯林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尤其考虑到中东地区进入调整时期，传统的盟友和伙伴关系正在破裂。印度如何保持好同伊朗、沙特、以色列的关系，仍是需要费力思量的。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印度的这一政策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冲击，尤其可能影响到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查巴哈尔港离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仅有72公里，阿富汗、中亚国家可以据此绕开巴基斯坦而拥有出海口，降低了对巴基斯坦依赖。然而，换一种思维来看，竞争也许是好事，正如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称，查巴哈尔港和瓜达尔港是“姐妹港”，而中国的政策也并非是要在二者择一，事实上中国石油公司已经在查巴哈尔港设下营地，计划建设大型的炼油厂。

时　评